

中图分类号: K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9684(2011) 05 - 0069 - 07

“应用史学”还是“史学应用学”

——浅论公共史学的学科属性

王立桩

(绵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 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 公共史学产生至今,已有 30 多年的历史,虽然还远未成熟,但是其产生的原因、独特的学科属性以及社会公众对它的角色期待,均标识着传统意义上的“史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经历着一次较大调整。导致公共史学产生的那场“危机”,与其说源自史学专业化的发展,不如说是现代社会职业分工进一步强化之后,社会要求史学做出应变的指令。顺势而兴的公共史学充当连接学院史学和社会公众的特殊社会角色,从而使史学发展中原先存在的诸多困境得以缓解。

关键词: 公共史学; 学院史学; 史学研究; 史学应用

The Applied History or the Employment of History

——A Study of the Disciplinary Attribute of Public History

WANG Li-zhua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Tourism Management,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Mianyang 621000, China)

Abstract: It has been about three decades since the emergence of public history. The new discipline is in the ascendant, but its unique discipline attribute and social function indicate a great chang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history and the society. The crisis that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public history was not an outcome of the history's professionalization but the social instruction that urged the history to make a response to the division of profession. Public history conducts a special role in society connecting the academic history with society. As a result, public history eased traditional history from those straits.

Key words: public history; academic history; history research; employment of history

公共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广受关注,最早把公共史学介绍给国内学术界的是几位旅美学者。王渊明在《美国公共史学》^[1]、游恒在《公共史学在美国的兴起与发展》^[2]两篇文章中,就公共史学起源、特点、功能等问题予以探讨,当时公共史学刚刚起步,其研究也就不可避免的带有“简介性”特点,不过正是他们的开启山林让我们开始了解公共史学。在沉寂十余年之后,学界将研究视角再次投向这一领域,杨祥银撰文对美国公共史学的最新进展进行了全面

的介绍^[3]、宋云伟则向更多社会公众作以推介^[4]。稍后,张云和程群分别在《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历史学的研究与应用》^[5]和《六十年来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的成绩与问题》^[6]两篇文章中,对公共史学进行了深入探讨。

上述文章虽侧重各异,却多围绕公共史学的基本特点,从学术史的纵向角度立论撰文,然而,公共史学的产生并非仅是史学自身发展衍变的结果,其背后有着更为复杂深刻的社会动因以及理论支撑。

收稿日期: 2011 - 06 - 15

作者简介: 王立桩(1978 -),男,河北孟村人,绵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讲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07 级博士研究生。

最近发表的两篇文章可谓对此的回应,王希教授撰《谁拥有历史》一文^[7],将对公共史学的关注拓展至更为复杂的社会层面,陈新教授则从历史意识构成及传递过程的角度对公共史学予以理论化的解读。^[8]笔者拟从公共史学和学院史学以及社会整体的关系切入,探讨公共史学的学科属性、巨大的社会价值以及良好的发展前景。

按照凯利(Robert Kelley)^①的说法,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是指历史学家就业以及将史学方法在学院以外的诸如政府、私人公司、新闻媒体、历史遗址、博物馆等领域加以应用的学问^{[9](P111)}。因其强调直接为社会公众服务,具有明显的“应用”色彩,故又被称为“应用史学”(Applied History)。自诞生之日起,公共史学的规模和影响日益扩大,如今,在美国之外的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也有相当的发展。可以说,公共史学已具有世界性的影响。然而,蓬勃发展的公共史学也面临着诸多困境和挑战:如何确立与传统史学即学院史学(Academic History)的关系、如何更加有效的为社会公众服务、如何在更大程度上赢得认同和尊重等等。这些问题所透射的是公共史学作为新学科的独特价值所在的根本性问题,其解决也是公共史学在学院史学与社会公众双重压力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之必须。

诊断“史学危机”

公共史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其间正处于始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史学转向。以下层人民为基调,研究“人民历史”和创写“人民历史”的思潮构成公共史学产生的时代氛围。在此背景之下,当时发生的“工作危机”是公共史学产生的最直接、最有力的促成因素。受美国70年代经济萧条的影响,各高校都削减招生计划,压缩历史系的教学编制。这种调整导致的就业市场紧缩,加大了史学专业学生,甚至史学博士的就业难度。面对史学界的困顿局面,人们名之“史学危机”。

在经济萎缩的情况下,为什么史学所受冲击尤其严重呢?原因还需从史学自身开始查找。19世纪末,美国史学步入专业化发展阶段,美国历史学会(AHA)于1884年成立,《美国历史评论》(A. H. R.)于1895年创刊,是这一进程的鲜明标志。一般认为,正是由于史学专业化的发展造就了一座与外界隔离的学术象牙塔,越来越精深的研究课题、越来越

越专业化的术语,使史学一方面丧失了应有的大众教育和欣赏功能,另一方面也自我疏离于现实社会之外。这也难怪,愈深愈长的专著论文、艰涩难懂的专业术语,的确令业外人士望而却步。但是,和小说作家不同的是,一个历史学家的贡献不能用拥有多大规模的读者群来衡量,相反,一般读者的缩减却是史学专业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之一。

理性地认识这种现象,是史学家和社会公众都必须正视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史学专业化所产生的问题与取得的成绩紧密纠结在一起,它们构成“史学专业化”这枚硬币的两面。此外,我们还需对史学专业化所产生的结果与过度专业化所导致的弊端作以甄别,在史学专业化的过程中,语言上的故意术语化、选题的琐屑零碎化,更多的是“专业化”自身发生畸变的后果,这并非“专业化”之初衷。因此,我们不能因读者减少而抹杀“专业化”对史学发展的贡献,更不能凭此就将其视为“史学危机”的根源所在。

纵观“专业化”之后的美国史学发展,从进步史学派、新保守史学派、新左派、新思想史学派到新社科史学诸派的兴替,它们的研究概莫能外,都处于“专业化”范畴之内,却都未曾脱离过自己的时代,甚至,其本身的出现也是当时社会氛围影响所及的直接产物。无论历史学家的研究思路如何变换,其研究成果与所处时代的风向是大体一致的。这就表明,历史学家作为社会中人,他们那强烈的现实关怀并未由于自身所从事职业的性质而有丝毫的消退,相反却将自己对现实的关注体认溶入到所从事的研究中。研究客体指向的“过去”与研究主体所处的“现在”之间存在着张力是必然的,虽然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认为历史就是现在与过去永不休止的对话^{[10](P28)}不无道理,但是将这一定义绝对化、庸俗化,史学就有可能因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而失去自身赖以生存的根基。与认为历史学家漠视现实、和当代社会距离太远相反,笔者认为,正是历史学家和时代跟得太紧、过度的社会参与意识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的“史学危机”。对于历史学家这种积极入世的心态,与其指责这是“专业化”的恶果,不如说是史学“专业化”的不够,正是由于“专业化”的不够充分给史学自身的发展留下阿喀琉斯之踵。

对“史学危机”进行诊断,一个不可规避的问题是:历史学是什么?人们给出的答案历来都是仁智纷见、莫衷一是。然而,“史学”之所以能存垂久远,将立足点放在“求真、求实”上应该是其长葆生命活力的根源所在。反观美国史学研究的发展轨迹,则明显的随时代风向而动。美国学者康马杰对此有着切肤之痛“国内的一场革命是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揭示并记载下来的。邦联条款的明显失败不再归咎于政治运筹乏术,而归咎于经济条件不佳。宪法本身也被看成是经济文献。为争取批准宪法而进行的斗争被人们解释得连卡尔·马克思也不会同意。”^{[11] (P425-426)} 康马杰在这里批评的由于研究者过度的“入世”情怀而对史学构成的不良影响应该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

在历史研究中,史观和历史建构模式的不断翻新虽有助于突破陈说,但对同一历史事件做出大相径庭的解释,这不仅损害史学研究自身的尊严和权威性,而且还会从根本上挑战史学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旅美学者王晴佳认为,“史学是追求真实的学问,只要人类社会有寻求真实、了解真相的愿望,历史学就有了存在的基础。一旦人们放弃这一愿望,只满足于虚构、想象,史学才会有真正的危机。”^[12] 这里无意说有社会参与意识就必然导致“虚构”和“想象”,但是,过度的参与就有使史学研究“失真”的可能。其中的症结在于“史学研究”与“史学应用”的杂糅。

“历史”作为人类组织化了的集体记忆,“就其缘起和本质而言,本是一项公益性的事业,它出于对整个群体命运的关怀,而不带有任何个人目的和利益取向”。^[13] 对它的“研究”就应如美国学者贝林(Bernard Bailyn)所言,其意义和价值在于获得关于过去实在的知识,扩大人类对自身的经验,使人类能超越自己生活和文化之外,看到更为丰富多彩的人类经验;人要弄清自己从何而来,现在居于何处,如何确立未来的方向,这些都离不开对过去的了解,一个社会维持一种健康状态,也需要历史知识的作用。因此,历史学家的天职就在于为社会提供尽可能完整和客观的历史知识。^{[14] (P12)} 由此可见,尽可能的“完整”、“客观”是历史研究的应有之责。而史学应用则属于另一个范畴。葛剑雄在谈及“古为今用”时曾对“用”作过剖析“‘用’本身是一种价值判断,

并不是绝对客观的,随着主体的不同会发生转变”。^{[15] (P147)} “运用”的过程存在着随机性和随目的性,显然与“研究”过程追求的“完整”、“客观”存在着取向上的不一致。史学研究和史学应用混淆不清,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就难以做到“完整”、“客观”,史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就无从发挥,它又怎能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和尊重,史学危机又怎能不发生呢?“用”字当头,历史学家是不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的。史学在中世纪欧洲沦为神学的婢女、中国曾经出现的“影射史学”,虽然是这一倾向的极端,却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解。

作为历史研究的行为主体,历史学家因受史学应用的牵制和干扰,不能很好地进行史学研究,从而使史学的社会功能难以发挥。这是史学危机产生的内在因素,除此以外,危机的产生还有着更深层的社会根源。

美国史学开始专业化的19世纪末,是社会工业化的高峰期。标准化、高效化和科学化是那时期美国社会的客观要求。这种背景之下,各行各业都有一个“专业化”的过程,和历史学一样,诸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专业性组织机构也纷纷成立。更为细致的职业分工构成现代社会转型期的显著特征。专业化、职业分化的发展在促进本学科的学术水平提升之外,还造成各职业、学科之间彼此生疏。这种情况刚出现时,不会给人们的工作生活带来很大的不适,但是当不同职业学科之间的分工进一步强化时,就真的是“隔行如隔山”了。一个“外行”面对日益专业化的历史研究也就只能望“史”兴叹了。社会职业化发展,客观上要求学者专心于自己的学科,而对史学则无暇问津。另外,日益“专门化”的史学研究成果,单靠他们自身去接纳、消化也的确存在困难。

从社会总体上看,行业学科之间相互生疏困境的解决是借助形成一个包括各种专家、顾问和指导者在内的职业阶层来完成的。这种“中介性”职业的快速增长被看作是现代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尼科·斯特尔的观察,“以知识为基础的职业的增多和更加求助于咨询、建议和专业知识的做法被看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肯定性的特征。”^{[16] (P239)} 而公共史学产生之前,史学和社会公众之间缺乏这种“中介”,表现出来的是对史学的不

用、误用甚至滥用。

在职业分工的前提下,不同学科“专业化”的发展使其他学科不仅无法从事“史学研究”,对“史学应用”也不甚了了,即使有也只能流于形式。“在目前的社会科学中,有一种‘对历史的运用’非常普遍,而实际上,它更是种仪式上的运用而非真正的运用。我指的是沉闷乏味的零碎拼凑,它作为‘历史背景的概述’为人所知,而对当代社会的研究往往以此作为开端。”^{[17] (P166)} 其实,米尔斯指责的这种情况还仅仅属于对历史运用的“不力”,真正对史学本身构成危害的是那种对史学的不用和应用不当,它不仅导致公众对史学的忽视、误解甚至敌意,而且对其他学科以及社会整体来说,由于缺乏史学的指导也会造成现实的损失。因此,客观上需要有人就怎样运用历史学进行指导。

当这种指导不存在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就难以保持良性的运转。因为社会作为有机的联系整体,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未能发挥应有的功能。无视历史或对历史的滥用,都会造成实际的损失。欧内斯特·梅(Ernest R. May)^②在《过去的“教训”:美国外交政策中历史的使用和滥用》一书中,列数“二战”以来联邦政府由于对历史的无知而造成的历次外交失误,足以让我们体会这种损失的程度。

就此而论,史学危机造成的危害已经超出史学范围以外而波及到社会的其他领域。因此,史学危机又是一次整体性的社会危机。然而,“危机”意味着“危险”和“机遇”共存,正是这次危机催生了公共史学的诞生。不管是从史学自身发展还是从社会需求来说,都需要有一个专司“史学应用”的学科存在。

社会对公共史学的期待

史学自身发展和整体社会发展的双重需要,催生了公共史学并使其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很大的影响。在美国,公共史学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机构——全国公共史学理事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创办了影响甚广的官方刊物——《公共史学家》(Public Historian)。为给从业人员提供相互沟通交流的机会,全国公共史学理事会还于1979年开始定期召开公共史学年会。众多的公共史学家在政策咨询、文化资源管理、公共史学教育等

领域为社会提供服务。

公共史学的这种社会角色得到了多大程度的认同,社会公众又对公共史学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2002年秋季,美国历史学会(AHA)下属的研究生教育委员会(Committee on Graduate Education)和公共史学特别工作组(Task Force on Public History)共同对雇佣公共史学家的机构进行了调查。^③结果显示,3/4的机构雇佣公共史学家的数量或保持增长(29%)或持续稳定(48%)。^{[18] (P36)} 这表明公共史学家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绩,公共史学也日益得到社会的认可。

但是,调查结果同样显示,公共史学家已取得的成就和社会的期望之间仍有比较大的差距。首先,对公共史学家的知识构成和技能要求上,已不再局限于对历史知识、史学技能的掌握,相比之下,对诸如博物馆学、档案管理等相关专业的知识技能要求更高。其次,基本技能而外,其他相关综合素质的要求对于习惯了书斋生活的史学从业人士来说更具有挑战性。其中包括,良好的写作、交流技巧;对本地方历史的兴趣;与普通人沟通的能力;和其他人共同工作的意愿与能力。此外,还要求公共史学家具有从组织到管理的多项技能。再次,虽然时下雇主更加青睐中层学历人才,但是,对公共史学家有更高的学历要求已是大势所趋。最后,摒弃学院史学单独研究著述的方式,而与他人协同工作,也是对以往工作方式的重大调整。

与上述几方面的要求相对照,公共史学家无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就工作性质而言,他们与专司“史学研究”的学院史学家从事的是完全不同的工作。而这些也更加清楚地标识出公共史学“史学应用”的学科属性。这次调查结果显示,社会公众对公共史学的一种明显的矛盾心态。一方面,雇佣机构对公共史学的“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充满期待,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自己的雇员素质现状表示不满。^{[12] (P38)} 其中暴露的问题在于公共史学自身学科定位的不够明确,这导致社会公众既以“史学家”又用“社会活动家”的双重标准去苛求“公共史学家”。

既然这一问题的产生在于公共史学自身,那问题的解决也不能寄希望于他人。公共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就需紧紧围绕“史学应用”而调整、完善本学

科的知识构成和技能培养,以便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要,从而彰显自身的价值,发挥自身的作用。公共史学家因受契约的限制,他们工作的服务对象是特定的雇主客户。“实用”、“市场导向”是由公共史学的学科属性决定的必然特点。这正是公共史学的独特性和优势所在,其独特的工作方式在高深的学术象牙塔与社会公众之间构筑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正如一位接受调查的人士所言“就多方面来讲,公共史学都是最重要的……它将象牙塔和社会大众联系起来。孩子们(包括他们的父母)接触历史,更多的是通过当地历史组织策划的活动,或者对历史遗址的凭吊,这些能激发他们对历史一生的钟爱以及对历史机构的支持。”^{[19] (P28)}

公共史学在满足社会需求、跟上市场节奏的同时,如何处理同学院史学的关系,又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公共史学特别工作组(Task Force on Public History)所做的另外一项调查显示,^④在当今美国史学界存在着相当规模的“兼职”现象。在一专门研究机构供职,又时常从事公共史学工作的从业人员比例高达85%;而27%的公共史学从业人员也进行学术研究工作。^{[11] (P26)}这表明公共史学与学院史学之间存在很普遍的交叉现象。可是,前面提到的两项调查又都显示出公共史学和学院史学的分离(split)倾向。回应者认为在公共史学与学院史学之间已经有很深的裂痕。^{[12] (P35)}接受调查的公共史学家们不仅提到了公共史学与学院史学的分裂,而且还提到了公共史学家与学院史学家的分裂。^{[19] (P27)}我们注意到,公共史学家对于两者的分裂更为敏感,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再认同美国历史学会(A. H. A.)对自己的代表性,而是更钟情于全国性或地方性的博物馆和历史协会、全国公共史学理事会、美国全国和地方历史学会以及美国博物馆协会等专门性组织。^{[12] (P38)}这种现象显示出公共史学家们对学院史学归属感的日益淡化,对自身独立性的逐渐认同。至于公共史学与学院史学之间的交叉现象,更多的是公共史学幼年时期的一种过渡现象。调查结果同样显示,公共史学的“独立”和“专业化”是社会对它提出的迫切要求。^{[18] (P36)}

既然“分离”已是大势所趋,那么史学研究和史学应用又该如何分离,或者说是在什么层面上分离呢?在学科交叉、跨学科研究同样成为“趋势”的背

景下,史学内部的这场“分离”必要性何在?

史学求真求实的内在属性、社会职业化的要求,共同决定了史学应用和史学研究的分离。这种分离,具体的说就是分工合作,因此,作为各自“执行者”的公共史学与学院史学的分离并不意味着两者的对立、相反,这种分离应该为两者进行更富有成效的合作创造了契机。因为“史学研究”和“史学应用”是人类发挥史学功能的一个逻辑序列和相继环节。学院史学是公共史学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后者则可以把史学研究的成果应用于社会、服务于社会。两者相互依存于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中,相辅相成地为社会进步提供服务。

只是在这种合作关系中,公共史学不是作为学院史学的一种依附角色而存在,而是一门以“史学应用”为宗旨的独立学科。就其社会功能的角度而言,公共史学应该称为“史学应用学”。从两者的各自特点来看,它们只有明识自己的学科定位以后,真正良性的合作才有可能。学院史学就此摆脱“用”的羁绊干扰、专心于自己的“研究”,又可应对来自外部社会“史学无用”的责难;公共史学则凭借自身独特的学科涵养,将史学研究的成果有意识、有目的地应用于社会。如果说此前史学的困境在于“养在深闺人未识”,那么公共史学的价值就体现在,将角落里的吟唱传播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公共史学的社会意义

评价一门学科意义大小的尺度,最终应落脚在其工作的实际成效上。公共史学近40年的发展,从诞生到不断成长壮大,反映的是社会公众对它的认可程度。然而,公共史学仍处于快速发展的幼年时期,其发展的路径、模式还处在摸索之中。因此,对公共史学的评定,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以及社会的检验。但是,就公共史学缓解史学和现代社会的发展困境而言,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贡献。

首先,公共史学的产生有助于厘清史学研究与史学应用的界限。正如贝林所言,史学研究的核心就在于“提供尽可能完整和客观的历史知识”^[14]。虽然探究真正的“历史真相”只是人类的一种天真幻想,但是史学家对真实的追求还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因此,尽量搁置主观成见以做到公正客观,是史学研究的内在规定性。与之对照,史学应用则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有取舍地学习和使用历史。质言

之,由于两者的取向不同,社会对它们的身份规定、公众对它们的角色期待也就有所差异。

公共史学产生以前,史学研究和史学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史学家”独自承担的。这种情况使史学家面对的困境在于,两种不同的社会职能却让一个社会群体去承负,现代社会的发展为“史学研究者”和“史学应用者”规定了不同的位置,也就是说,他们有着不同的“身份”,扮演不同的“角色”。两种不同的身份由一个主体去扮演,结果必然会出现社会学意义上的“角色冲突”。^{[20] (P157)}

在这种情况下,避免角色冲突,真正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就取决于“史学研究”和“史学应用”的严格区分了。而公共史学专司“史学应用”的特点,既可以将史学“应用”得更加专门化、有效化,也可以把史学研究从“用”的重负下解放出来。可以说,它已经具备了避免“角色冲突”、摆脱困境的基础和条件。

其次,公共史学的产生有助于消除史学固有的“普及”与“提高”之间的内在悖论。如何才能既使史学研究更快地走向深入,而又能使史学研究的成果惠及普通社会公众呢?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历史学家们,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社会对史学的认同和尊重。然而,日益高深、日益专门化的史学研究成果让普通公众去理解、把握和运用,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一种非难!而公共史学的产生则可以为这一难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启示。如前文所述,公共史学的社会职能就是能在专业史学和普通公众之间建立起一种链接,因此,它有可能使“普及”和“提高”得以良性互动。

《光明日报》社主任编辑马宝珠先生认为,史学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本质在于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只有在产生一定的影响时,才能产生一定的社会价值;而当它获得社会价值时,其学术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研究的社会价值乃是检验其学术价值的最重要的尺度之一。”^[21]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公共史学所承担的社会使命就是将史学研究的成果应用、服务于社会,从而使史学的学术价值在社会应用层面上得以呈现。为达此目的,需要公共史学家做的不是以更加浅显的著述让社会公众“读懂”,而是以自己的实际

工作服务于社会,在每一个领域给社会以历史的指导。这同样也是一种“普及”历史的路径,而且,在职业分工日益强化的现代社会也更为现实。

史学专业化以来,很多人批评专业化了的史学艰涩难懂,其语言上的术语化更是为人所诟病。但是,对于更多的普通公众,无法理解史学著作的根本障碍并不在于“语言”之艰涩,而在于对“内容”的无法驾驭。这里也反映出人们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史学的确需要普及,但社会需要普及的“史学”不仅仅是浅显易懂的“史学读物”,更迫切需要的是“史学的指导,史学真正的社会价值”。因此,史学无法“普及”的症结不在于“专业化”。相反,正是进入“专业化”时代以来,史学研究在各个领域均获得了长足发展,史学学术水平的“提高”更是空前迅速。

在公共史学产生之前,“普及”和“提高”很难做到两全,是因为在现代分工的前提下,不同职业间的分化进一步加强。不同学科在各安其职的情况下,社会需要分离出新的学科来完成因职业分工而“碎片化”后的社会链接。

最后,公共史学的创始者们“创造”公共史学的初衷之一,就是应对当时的“工作危机”,解决大批史学从业人员的生计。公共史学的发展也没有辜负“创始元勋”们的期待,它的确为“历史学家”开辟了一个新的就业领域。在当今美国,从联邦政府的办事机构到私人企业的各个层次上都有公共史学家们的身影。

结 语

作为“危机”产物的公共史学,却为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某种路径与启示。史学研究和史学应用的混淆、史学提高与史学普及之间的紧张,这些直接决定着“史学”的学术质量和社会价值的大问题,公共史学有可能给予较为圆满的解决。究其堂奥,盖因为公共史学的诞生是顺应了现代社会专业化、职业化的发展趋势。现代社会发展的这种趋势,一方面造就了公共史学这一新的学科,另一方面,也规定了公共史学的学科属性、学科特点。公共史学要想在现代社会中谋得一席之地,就必须明确自身“史学应用”的学科定位,充分发挥好学院史学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桥梁作用。这既是解决史学发展顽疾的需要,更为公共史学自立于社会所必须。

需要指出的是,公共史学与学院史学的“分家”

决非“史学应用”与“史学研究”的绝对分离、不相往来,而是明确自身学科定位的心态调适。正如史学本身虽无法完全复原“历史的真相”,但史学家对真相的追求却不应放弃一样,无论是学院史学还是公共史学,有意识的明确、强化自身的学科特点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作者附识:拙文初稿作为“世界史精品课程班”作业草就于2004年,幸蒙课程班主讲教授王希老师指正,2009年笔者又曾就公共史学问题求教于复旦大学陈新教授,两位先生不计学生愚拙悉心提点,在此谨致谢忱!)

注 释:

- ① 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ey)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学院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 简称 UCSB) 历史学教授,公共史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 这一术语的最早提出者。
- ② 欧内斯特·梅(Ernest R. May) 哈佛大学历史系外交史专家,公共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曾对社会由于无视和滥用史学所造成的损失做过研究,除文中提到的《过去的“教训”: 美国外交政策中历史的使用和滥用》(Lessons of the Past: The Use and Misuse of Hist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之外,还和理查德·纽斯塔特(Richard E. Neustadt) 合著《时间的思考》(Thinking in Time),指责卡特总统在任职期间由于“不从历史角度考虑问题”而造成的政策失误。
- ③ 这是一次针对公共史学家雇主的调查,总共收到有效问卷201份。虽然不能反映出公共史学的总体发展特征,但是,这项调查还是基本上反映出公共史学家在非学术领域供职时所面对的工作环境。
- ④ 此项调查是公共史学特别工作组(TFPH) 通过电子邮件向全部美国历史学会(AHA) 成员征询意见,共有676位成员给予回应。

参考文献:

- [1] 王渊明. 美国公共史学[J]. 史学理论, 1989 (3).
- [2] 游 恒. 公共史学在美国的兴起与发展[M]//中国留美历史学会. 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中国留美历史学论文集[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 [3] 杨祥银. 美国公共历史学综述[J]. 国外社会科学, 2001 (1): 33-37.
- [4] 宋云伟. 公共史学与史学现状[N]. 中华读书报, 2003-12-10.
- [5] 张 云.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历史学的研究与应用[J]. 江汉论坛, 2003 (5): 67-71.
- [6] 程 群. 六十年来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的成绩与问题[J]. 河北学刊, 2004 (5): 182-189.
- [7] 王 希. 谁拥有历史: 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发展和挑战[J]. 历史研究, 2010 (3): 34-47.
- [8] 陈 新. 从后现代主义史学到公众史学[J]. 史学理论研究, 2010 (1): 12-14.
- [9] Robert Kelley. Public History: Its Origins, Nature and Prospects[C]//Phyllis K. Leffler and Joseph Brent, Public History Readings, Malabar: Krieger, 1992.
- [10] [英]爱德华·卡尔. 历史是什么[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1.
- [11] [美] H·S·康马杰. 美国精神[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 [12] 王晴佳.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J]. 史学理论研究, 2000 (1): 130-142.
- [13] 张耕华. 论历史学的用途及其滥用和误用[J]. 史学理论研究, 2003 (3): 130-143.
- [14] Bailyn Bernard, On the Teaching and Writing of History: Responses to a Series of Questions[M]. Ed, Edward C. Lathen. Hanover, NH: Dartmouth College, 1994.
- [15] 葛剑雄. 历史学是什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16] [加拿大]尼科·斯特尔. 知识社会[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 [17] [美] C. 赖特·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象力[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 [18] Philip M. Katz, Public History Employers—What Do They Want? Airport on the Survey [J]. Perspectives, Vol. 41 No. 6, September 2003.
- [19] Linda Shopes and Debbie Ann Doyle, the Task Force on Public History: An Update [J]. Perspectives, Vol. 41 No. 6, September 2003.
- [20] [美]戴维·波普诺. 社会学[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 [21] 马宝珠. 关于史学普及与提高的几个问题[J]. 史学理论研究, 2001 (1): 47-56.